

拥抱人民的战士作家

——孙犁革命活动与文学创作回眸

□赵振杰

今年是作家孙犁(1913.05.11—2002.07.11)逝世20周年。翻看《孙犁年谱》可以清晰地发现,孙犁的求学经历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十分合拍: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孙犁进入本村的国民小学课堂,开始接受新学制的白话文教育,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在他升入初中时,正值北伐革命高潮期,孙犁有意识地接触到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尤其对鲁迅的小说情有独钟;1926年,13岁的孙犁考入革命文化气息浓郁的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求学期间,又历经大革命失败、“九一八”事变、保定学潮、高蠡暴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他博闻强识,奋发图强,不仅大量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学习辩证法和唯物论常识,而且在左翼和苏联作家作品的熏陶下,开始初步尝试文学创作,内容涉及婚恋自由、礼教吃人、抵御外辱等,呈现出鲜明的启蒙理性精神和“为人生”的创作思想;高中毕业后,孙犁前往北平,虽生活拮据,却不改其志,节衣缩食,在广泛订阅鲁迅作品和多种革命文艺期刊的同时,积极开展文艺理论探讨,先后写就《同路人》的文学论》等论文;在听闻北平军警暴力镇压“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孙犁毅然辞职返乡,临行前,在《大公报》副刊留下诀别诗一首,抒发心中对国民党当局无限愤懑与彻底绝望。这些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创作“前史”,为孙犁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告

急,保定失守。吕正操组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司令部就设在孙犁老家安平县城。1938年春,经育德中学同学介绍,孙犁至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参与抗日宣传活动,自此正式开启“以笔为枪”的革命生涯。4月5日,孙犁的论作《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油印发行,文章开篇写道:“民族解放战争是最艰苦最需要持久的战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要尽量发挥它本身特殊的力量。”这一观点的提出,体现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坚定的信念和敏锐的直觉。

1939年夏,孙犁被调任晋察冀边区,在通讯社做指导工作,由于要与各地通讯员频繁进行书信联络,他很快据此编写了一本通讯指导手册《论通讯及通讯写作诸问题》,该书是晋察冀边区最早研究文艺通讯的论著之一,为河北省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创作指南。1941年春,冀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孙犁根据编辑《冀中一日》的心得,撰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更名为《文艺学习》)。全书以深入浅出文字,深刻阐明了创作者们“为革命而文学”的创作理念,详细论述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时代之间的血肉联系,在晋察冀边区文艺界产生极大反响。这段时期,孙犁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创作了《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儿童团长》《邢兰》《春耕曲》《女人们》《芦苇》《战士》等多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以自然朴素的笔触描绘出冀中人民昂扬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风貌。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两次重要讲话,最终整理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不仅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同时也针对解放区文艺的新经验、新问题、新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并作出相应回答,如文艺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的问题,文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等。

细致梳理孙犁之前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其始终与《讲话》精神相契合。1938年,刚参加革命的孙犁在《现实主义文学论》中指出,正确的世界观需建立在顽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1939年,他又在《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中重申了“为革命而文学”的主张;1941年,在参与边区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时,孙犁特别强调:“建立民族形式的过程,也就是彻底大众化的过程”“接受中国遗产,要接受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战斗的、充分表现当时大众生活和愿望的文学。”这些观点都与《讲话》所倡导的文艺方针保持了高度一致性。

1944年,孙犁奔赴延安,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后担任教员。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孙犁迎来文学创作的一个“井喷期”,《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相继发表了《山里的春天》《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杀楼》《荷花淀》《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村落战》《麦收》《芦花荡》等一系列作品,并在延安文艺界产生较大影响。1949年,天津解放,孙犁随军进城,参与筹备《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创刊工作,并以此为契机,为中国当代文艺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形成了后来著名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

挖掘生活真相 探寻人性光辉

——评胡学文小说集《逐影记》

□张燕峰

鲁迅文学奖得主胡学文的中篇小说集《逐影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逐影记》《白梦记》《丛林》《内吸》《去过康巴诺尔吗》五篇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胡学文仍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但他惯有的冷静犀利的笔锋,聚焦社会平凡人物,剥离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观照他们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挖掘出人物内心深处无以名状的存在焦虑,以此追问与探寻的是有关存在与虚无、现实与荒诞、绝望与反抗之间的艺术辩证命题。

作家加缪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荒诞。

小说家的使命就在于透过荒诞和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挖掘生活真相,探寻人性的光辉。在这部作品集中,作者不断寻求突破,引领读者穿越幽暗的现实,抵达生命与灵魂深处。《逐影记》中安娜不在意小镇人们的恶意诋毁,坚持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但世俗的误解最终吞没了她,也令米东清陷入无法自拔的自责之中;《白梦记》描写吴然因过失杀人入狱,父亲吴子宽为寻求事件真相而产生无以名状的存在焦虑。《丛林》《内吸》《去过康巴诺尔吗》分别讲述无法逃避的家庭关系、社会“潜规则”和信任的缺失、诱惑面前不同的人生选择。沉闷的现实中,总有人敢于冲破僵局,赤手空拳杀出一条血路,尽管前路茫茫不容乐观,可能会因此背负更多的沉重,甚至是凶险,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这就是人性的光辉,是照亮现实的一缕光。这光虽然微弱,但足以将沉闷的现实撕开一个口子,照亮人心。

《逐影记》在艺术上更加圆熟、成熟。首先在材料的取舍上具有含蓄之美,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安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众人口耳相传的放荡女子,还是周旋于男人世界被侮辱伤害的可怜女人;吴然到底因何杀人,突然现身的刚子,到底和吴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宋刚在开矿时到底有何样的经历,他为什么辗转不同的城市汇款而不留姓名;马坤因何坐牢,落入湖水中的到底是谁……这些小说中悬而未决的疑点,正是作者取材的高明之处。作者故意设下迷局,述而不露,留给读者揣摩、深思、遐想。

《逐影记》采用双线结构,警察米东清和村民马远的故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结尾处交汇相融。《白梦记》中吴子宽和刚子也是两条线索,时时交叉,缠缠绕绕。这些都彰显了作者谋篇布局的功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总之,中篇小说集《逐影记》透过荒诞的现实世界,挖掘生活的真相,洞悉幽微世界的繁复、隐秘,探寻人性的光辉。作者试图向读者展示,唯有直面苦痛,才能探测世界的本质与本相。

在细微处传递 震撼人心的力量

——评长篇报告文学《给流浪儿童一个家》

□刘翠娟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大多数儿童享受着父母的关爱,生活幸福无忧,但也有一些儿童正身处困境,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牵动着众多人的心。作家杨辉历时五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给流浪儿童一个家》(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以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简称少保中心)的成立、完善、发展为“经”,以身处困境的儿童的人生轨迹为“纬”,用细腻温暖的笔触,书写党和政府对困境儿童的救助,展现了少保中心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并向社会、家庭、学校发出呼吁,关注、关心困境儿童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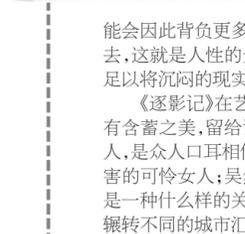
作品聚焦困境儿童的命运,对人物的塑造摆脱了“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的逻辑,以真实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困境下,孩子们迥异的性格和不同的命运走向。作者采访了百余名困境儿童,选取了十多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抽丝剥茧,深入人物内心,真实呈现了困境儿童的生命境遇。作者记录困境儿童的现状,没有停留在还原生活表层上,而是通过探寻其生存轨迹,在叙述、反思、探求中寻找解决之道。整部作品利用倒叙、插叙等多种写法,从原因、问题、现状、未来等多层面剖析困境儿童的心理路程,流畅自然,收放自如。

人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而这种矛盾性在困境儿童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渴望拥有温暖的家,却往往用冷漠和叛逆包裹自己。他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却总会迷失方向。他们或因经济贫困、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少年自身等原因而离家出走,或因被拐卖、受胁迫而受到伤害,或因父母去世、服刑等无人照料,或因身体残疾被遗弃……作者怀着悲悯的情怀对造成少年儿童深陷困境的根源进行挖掘、分析,以期引起社会、家庭的关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品结构严谨,采用纵横交织式的叙事方式。每个故事看似独立,但是人物命运之间又因少保中心的救助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纵横交错,层次分明。该中心协调孩子和家庭的关系,注重心理辅导,让孩子们回归家庭;为儿童寻找合适的寄养家庭,让他们重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没有家庭可回归的孩子,少保中心就是他们的港湾。在这里,老师们不但传道授业解惑,还负责生活保障、疏导心理、规划未来。

作品最为打动读者的是对事实的真实呈现。作者足迹遍布全国,历时五年采访被救助的孩子百人之多,从他们的人生故事中,直面流浪儿童的生存现状以及在少年儿童保护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真实呈现救助成效的不完美,探索保护、教育困境儿童这一社会课题的方式方法。书中人物鲜活立体,感情真挚自然,文字平实有筋骨,情节生动感人,在细微处传递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者在书中说道:“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做好流浪儿童的教育工作,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今天,更在于未来。”作者致力于写出流浪儿童这个群体的现状,给弱势群体以关注、帮助,源于身为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这部作品“为的就是给世人以警醒,引发更多人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



文坛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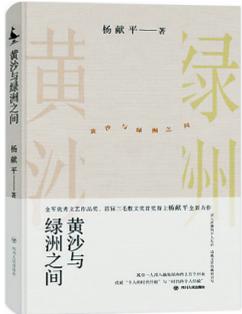
1938年,刚参加革命的孙犁在《现实主义文学论》中指出,正确的世界观需建立在顽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1939年,他又在《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中重申了“为革命而文学”的主张;1941年,在参与边区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时,孙犁特别强调:“建立民族形式的过程,也就是彻底大众化的过程”“接受中国遗产,要接受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战斗的、充分表现当时大众生活和愿望的文学。”

状写奇特有趣的沙漠生活

——评杨献平散文集《黄沙与绿洲之间》

□冯祉艾

在黄沙与绿洲之间,若以穿越的弱水河作比,杨献平散文中滋生蔓延的孤独,再恰当不过了。“鸿毛不浮,水弱不能载舟”是弱水河的柔弱本性,这条河流却在荒凉、干燥的沙漠中滋养了万物生灵,犹如孤独却不乏苦闷,却不无精妙之处。杨献平散文集《黄沙与绿洲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字里行间弥漫着孤独的气息,作者在巴丹吉林沙漠悠长甚至寂寥的岁月中,对生活、生命、精神和灵魂有了超乎常人的体验和期许,也对人及诸多的沙漠生灵给予了平等的关注。读这部散文集,犹如行走在从黄沙抵达绿洲的旅途,无处不见黄沙,而又无处没有绿洲。作品流露出的孤独与寂寥沉重且沉静,有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洒脱之气,也有着“大漠沙如雪”的觉悟和空灵。



从“这里”到“哪里”的迷茫,到乡村少年渴望融入城市的平凡渴望,再到返璞归真的虔诚,作者的主观变化不断印证其思想的转变,犹如朝圣者的步步祈祷,每一次醒觉都是一次引导、洗涤、升华。巴丹吉林沙漠,犹如智者和导师,不断启迪身处其中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既包括对客观世界的重新审视,也包含对主观世界的深深内省,达到了灵与肉的高度统一。

作者在其间穿插了诸多历史风云、民间和民俗故事等颇具神秘色彩的元素,前者给予散文以深厚的文化气息和岁月感叹,后者则更倾向于玄幻之说,再加之梦境的调和,在灵与肉的统一中,又呈现灵与肉的分隔。统一是现实的诉求,而分隔则是探寻的羁绊。由于取材于民间及人类本能,也因为人间烟火气的加入,使得这些形而上的深思熟虑,更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民间传说、秘闻故事、民俗风情的

融入,让形而上的哲理思考更具魔幻主义色彩,也更具人文关怀。作者以人为第一视角对沙漠的生态进行描写和叙述,使得各种生物求生的本能都可以在人性得以体现,若以作者的视角来观察沙漠的生态,则更多一份人性本能在极端环境下的动态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既来之,则安之”的生存智慧,他们善于在艰苦的环境下创造自己的天地,他们适应却不屈服,在顺应规律的发展中体现出的敬畏和虔诚,是人类与万物共鸣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状态应是随处可见的,但在沙漠这一极端环境当中,这种万物和谐境界却更为震撼。

《那斯腾》一文,主人公为沙漠牧民那斯腾,作者通过对他生活的描述,体现出孤独的本质是与大多数世人有某种程度的隔膜。在那斯腾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在远离人群的生存状态下,与天地自然的融合显得更加自由、沉静,这其中也有着深深的孤独与悲怆。作者对沙漠中的骆驼有这样的认识:“死亡之地,人间绝域,以身为舟,不仅度己,而且度自己能负荷的任何一种生命。”

将沙漠的古老与广袤融合,则愈发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或许在不断地攀登中,真正到达高处,才愈发觉得人类

于瀚海沙漠而言,无异于微尘碎沙。在《乌鸦或幻境》一文中,作者加入了梦境元素,梦境通常被看作是灵与肉的分隔,“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对梦境最简单的解释,而实质上,作者似乎无意于用科学的说法来解释梦境的生成,在作者极尽细致的描述中,梦境的产生或许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更多体现为潜意识的涌动,被认为是恍惚之中的认定与坚持,这一层面更偏向于主观的活动,寄托的是一种人脑中对于情感的维系。其中,梦境的预示掺杂着对人生无常、生死宿命的自我感知,在朦胧的魔幻色彩之下,揭示出哲思的真谛。

凡是有人地方就有故事。《夜行者》《犹如蚂蚁》《沙尘暴中的个人生活》《爱情之下,陌生人的痛与乐》《沙漠爱情故事》《黄沙中的城与乡》等文章,切实写出了人在大漠之中的现实与精神困境,也写出了边地人群的日常以及生命在绝地的真相。

作者在书中以身处巴丹吉林沙漠21年的个人体验,呈现了沙漠与绿洲之间散落在存在的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凝练了关于人性、人生、人文的哲学思考,具有穿透时空、直抵人心的力量。

我们怎样学会告别

——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评析

□林 颀

“他乡遇故知,是小说的经典开篇法。”在2006年出版的《青年名家谈小说》一书中,李白写下了这句话。李白是个虚构人物,路内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的主角。这部小说就是以李白这句话开头的,紧接着:“十二年后,他再次听人吟诵,是在上海市陕西南路某咖啡馆,曾小然从背后轻拍他的肩膀。”“他乡遇故知”构成了《关于告别的一切》的核心命题。李白将不断地遇见“故知”,不断与她们告别。这些“故知”都是李白的“青梅竹马”:曾小然、钟英、方薇、周安娜、叶曼、廖美琪、卓一璇……这里的青梅竹马,不是指她们与李白相识于年少,借用叶曼的话来说:“等时间过得更久些,你再回忆今天,我也会是你的青梅竹马。”在不断长大的时间、不断的告别中,她们陆续登场,渐渐隐退,与时间融为一体,成为“青梅竹马”。

路内的小说向来有许多迷人而富有生命力的女性。在“追随三部曲”《花街往事》等作品里,她们是青春的女孩。这些小说基本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末,对于1973年出生的路内来说,它们都是他的青春记忆的回放与改写。

已近天命之年,知道了理想实现之艰难,敏锐地感知青春之易逝,他的女孩变成了更成熟的女人,她们与李白有情感的纠葛,但不油腻、不造作,她们有着身为“青梅竹马”的不被世故改变的纯真,没有因为美丽而成为“被窥探”与“被消费”的对象。这是男性作家笔下自然流露的对女性的尊重与喜爱,路内的写作有别于青春疼痛的伤痕文学,语言干净节制并且幽默自嘲,是真正有阅历的人深度、大度的书写。

阅读路内的小说,总是容易被触动。我们都生于20世纪70年代,有着同样的县城生活的体验。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受到“认识激情”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的世界”。在路内这里,日常生活进入并成为叙事的主角,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广泛的社会生活叠放在一起,呈现了日常生活时间的存在意义,如果简单地谈,路内的小小说就像一部缓缓展开的年代剧。

在从前,它们是戴城、是蔷薇街,而现在,它是吴里,是太子巷。这个发生在小城巷子里的故事,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一个院子住着几户人家,网状结构的熟人生活圈,谁家发生一点小事,第二天保全巷子的人都知道。而路内跳脱了写实小说那种过于琐碎与庸常、拖沓的节奏和艺术美感的匮乏,他的文字有着赫拉巴茨式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但他没有那么欢腾,而是更加沉静从容,是轻盈的嘲讽,是追忆和缅怀。李白的故事有那么一点点炫耀,也有着无可奈何的悲凉和忧伤。

与小巷生活变迁一起的,还有李白父亲李忠诚所在的国营机械厂的兴衰,李白母亲白淑珍曾经工作的园林茶室也有侧写,补充了故事发生地的江南地域特点。此外还有太子大酒店作为消费的象征物和人物展开故事或倾心交谈的场所。路内以漫画式的笔法描摹工厂生态,李忠诚的职业生涯取决于一些与工作毫无关系的意外,路内的小小说把工人无法掌控的命运走向,还有与工厂生态如出一辙的父权家

